

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

楊國斌

摘要

網絡事件是一種新型的集體行動事件，構成抗拒當代中國「大轉型」的反向運動的一部分。本文運用社會運動理論中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網絡事件，發現網絡事件的動員，所依賴的是能夠激發網民的嬉笑怒罵、喜怒哀樂等情感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網絡事件的發生，是一個情感動員的過程。文章通過對兩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網絡事件中情感動員的兩種風格。《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代表的是戲謔的情感動員風格，常見於網絡文化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代表了悲情的情感動員風格，見於涉及各類社會不公的網絡社會事件。

關鍵詞：網絡事件、社會運動、文化分析、情感動員

楊國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亞洲與中東文化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運動、新媒體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電郵：gy2112@columbia.edu

Of Sympathy and Play: Emotional Mobilization in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YANG Guobin

Abstract

Internet incidents are a new form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y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untermovement agains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bilization of internet inc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alysi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t argues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internet incidents depends on those expressive forms and content that may produce among internet users such emotional responses as joy, laughter, anger, sadness and sympathy. The occurrence of internet incidents is thus a process of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two styles of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rough two case studies. The incident known as “A Bloody Case Triggered by a Bun” represents a humorous style of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nd is typical of internet incidents involving cultural issues. The other incident, known as the “Shanxi black kiln” case, represents mobilization that appeals to the sentiments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most often seen in cases involving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injustices.

Keywords: Internet incidents, social movement, cultural analysis, emotional mobilization

引言

近年來，大陸的網絡事件(或稱新媒體事件)層出不窮。有很多事件涉及重大社會問題，或引發廣泛的網絡抗議，或推動自發的公民行動，或波及主流媒體和國際媒體，在海內外產生很大社會影響。有代表性的網絡事件包括「孫志剛事件」、「劉湧事件」、「寶馬事件」、「黑磚窯事件」、「華南虎事件」等。本文認為，網絡事件的產生和擴散，所依賴的是能夠激發網民的嬉笑怒罵、喜怒哀樂等情感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網絡事件的發生，是一個情感動員的過程，而傳統社會運動理論中的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的理論範式，並不能充分揭示網絡事件的動因和意義。本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從情感動員角度研究網絡事件，並試圖通過對網絡事件的情感動員的分析，揭示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

作為網絡公民運動的網絡事件

網絡事件是勃興於中國大陸的網絡公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網絡公民運動，是指借助互聯網等新媒體手段展開的公民集體行動。新媒體的手段有多種，或通過互聯網來組織和動員網下的行動，或以網絡空間為主要陣地，在網上展開各種形式的抗議和行動。以網絡為陣地展開的公民行動，包括各類網絡維權、網上反腐、網上簽名、網絡民間救助，以及眾多的網絡社區和博客作者所發起的大小集體的行動。但社會影響最大的，是「網絡事件」。

網絡公民運動的發端與互聯網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保持同步，表現出相互促進，共生共榮的特徵(Yang, 2003a)。1994年大陸正式接通國際互聯網服務，1995年清華大學開通大陸第一個BBS「水木清華」。之後，北大、南京大學、西安交大等校園BBS相繼開通。1996年，幾大高校BBS的用戶通過網絡抗議和聲援等活動，參與了國際保釣運動。1998年印尼對華人的暴行，引發全球性華人抗議，互聯網成為協調和組織的重要手段(Yang, 2003b; Wu, 2007)，其聲勢浩大，也波及中國大陸的網絡空間。大陸網民在網上網下均有抗議活動。

九十年代規模和影響最大的網絡抗議，發生在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戰機轟炸之後。當時的《人民日報》「網絡版」建起「抗議北約暴行論壇」，成為大陸網友抗議活動的主要陣地。據稱「抗議論壇」在短短一個月內，上貼達到九萬條。這次抗議活動之後，論壇更名為「強國論壇」，在論壇創辦一周年之際，註冊用戶達三萬個，頁面日訪問量達十萬，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全球中文論壇(盧新寧，2000)。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着互聯網在中國大陸的飛速發展，網絡事件更為頻繁。研究者論及較多的有「邱慶楓事件」、「孫志剛事件」、「黃靜事件」、「劉湧事件」、「孫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寶馬事件」等(彭蘭，2005；Yang, 2003c, 2008, 2009; Zheng, 2008)。現有研究對網絡事件尚無明確的界定。本文認為，網絡事件是一種新型的集體行動事件，既具有傳統抗議事件的特點，也有跟互聯網和新媒體密切相關的新特點。因此網絡事件，亦可稱為網絡集體行動事件。在社會運動領域，對於抗議事件的研究，一向側重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動態的過程(Olzak, 1989)，但近年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關注事件對集體行動過程甚至社會結構的轉化作用(Sewell, 1996; Benski, 2005; Yang, 2005)，以及對參與者的影響(McAdam, 1989; Whittier, 1995; Yang, 2000a; Lee & Chan, 2008)。本研究的重點是網絡事件發生的動因和過程。¹

網絡事件涉及的內容很廣，有的屬於文化表達和道德論爭，我們把這一類稱作網絡文化事件。2003年的「木子美博客」事件和2005年的胡戈惡搞電影《無極》，應屬此列。也有很多網絡事件涉及重大社會問題，如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對貪官污吏的揭露。這類事件帶有社會、經濟或政治訴求，因此可稱為網絡社會事件。當然，有些事件很難絕對歸屬哪一類，也有的兩種屬性均有。如2007年的「華南虎事件」，一開始基本屬於文化事件，網民們爭論的只是虎照的真偽問題。發展到後來，成為社會事件，網民表達出要求政府調查真相的訴求。

網絡事件一般發生在有影響的BBS論壇或網上社區，或由網外危機事件觸發，或由論壇的一兩個帖子引起。而網民參與則具有在危機情況下受到震撼而作出迅速反應的特徵，是一種「反應式的共同行動」(concerted forms of responsive action)(Thompson, 1995)。其次，網民參與的主要方式，是口頭抗議與表達。最常見的形式是主帖後，大量

跟帖，對主帖所表達的內容進行回應。很多案例同時伴有網上簽名、聯絡官方媒體曝光，甚至駭客攻擊等行為。很多情況涉及網下動員和網下行動，但從嚴格意義上說，網下行動已屬於網上動員的結果。第三，網民的參與多為自發，組織性不強。即使在有組織的情況下，也大多依託網絡社區作為組織平台。第四，網絡事件的影響愈來愈大，不僅限於網上輿論，而且對公共輿論和國家政策等有直接影響。

從宏觀角度看，網絡事件的發生反映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期的特點。貧富分化、貪污腐敗、環境破壞、文化價值觀的變化等等因素，都在網絡事件中有直接反映，使得網絡事件構成抗拒當代中國「大轉型」的雙向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王紹光，2008)。當然，網絡事件也反映了中國大陸網絡文化的特點。在這方面，近年興起的網絡惡搞、網絡推手、網站賺點擊的策略，都會影響到網絡事件的發生。網站和網絡社區的運作方式及商業利益，對於網絡事件的生成，同樣具有重要作用。論壇的帖子上不上頭條，是否置頂，直接影響到帖子的訪問量。網站本身的名氣和影響也很重要。關於政治、文化、商業力量對於網絡事件的影響，不在本文論述範圍(詳見Yang, 2009; Zhao, 2008)。本文的目的是突出網絡事件中一個被忽視的特點，即事件中的情感因素。本文從社會運動的情感動員角度出發，在微觀層次上考察近年網絡事件的生成機制，揭示情感動員在網絡事件中的核心作用。

相關研究

因為互聯網技術發展的關係，基於互聯網的社會運動在西方國家發展較早。對於這類新興的社會運動，西方學界亦早已有所關注。九十年代後期就有研究網絡抗議的專著問世(Gurak, 1997)，近年更加受到重視。有研究者將網絡運動(online activism)分為兩類，一類是網外的社會運動組織如何使用互聯網等現代傳播手段進行動員和抗議，另一類是直接發生在網絡空間的抗議行為，如駭客攻擊、網絡簽名等(Vegh, 2003)。目前西方學界研究較多的是前一種，如各類人權組織、非政府組織、環保組織、反全球化組織等對互聯網的利用。

Garrett (2006) 對互聯網等新信息技術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的研究

進行了綜述。他認為從動員結構上看，新信息技術降低了參與成本，有助於集體認同的建構，因而能夠促進動員，同時加速運動的擴散，並提供新的行動方式。從政治機會方面看，新技術有助於跨國行動，因此對國家內部的集體行動有影響，對國家機器的鎮壓行為起到一定制約。從框架建構(framing)方面看，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可以通過新媒體來建構框架，而不必依賴主流媒體。另外新技術還可以使社會運動的理念在全球傳播。

由此可見，西方學界對於網絡運動的研究，基本出發點是把互聯網當作新型的動員資源，研究社會運動組織如何利用網絡進行動員，而較少研究發生在網上的抗議活動。這也反映了西方網絡運動的基本特點。前面說到的兩類網絡運動中，網外運動組織發動的，利用互聯網手段進行動員和抗議的居多，而發生在網上的，基於BBS和網絡社區的抗議則影響不大。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網上抗議曾在西方產生過較大影響。Gurak (1997)的《賽博空間的辯論與隱私》，就記錄了九十年代初發生在美國的兩次BBS論壇中的抗議活動。後來發展到所謂的「智慧暴民」(Rheingold, 2002)及網根(netroots)，重點則轉向以網絡為平台對網下集體行動的動員。² 在中國大陸，基於BBS的網上抗議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出現後，不僅一直保持不衰，而且日漸興盛。如今，這類基於BBS和網上社區的網絡事件，雖在西方已經式微，在中國卻聲勢日隆，構成中國大陸網絡文化的重要特色。

關於網絡事件的發生，經典的社會運動理論難以作出充分解釋。經典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即政治機會、組織資源和框架建構，均不能完全適用於網絡事件的分析。如果說網絡事件的發生與政治機會有關，卻不足以說明，為什麼網絡事件主要涉及某些問題，而不涉及另外的問題(如法輪功)。而且政治機會的變化需要時間，但網絡事件的發生卻難以預測，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組織資源強調組織在社會運動中的力量，這些資源或是正規的社會組織，或是非正規的組織形態，如朋友、同學、老鄉等。其基本理論假設是「社會組織的密度愈大，社會運動活動發生的可能性就愈大」(McAdam, McCarthy, & Zald, 1988: 703)。問題在於，正規的社會組織因受到組織發展需要的限制，一般情況下不願採取過激行動。而非正規的組織形式卻又普遍存在，

因此與社會運動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Piven & Cloward, 1977)。而且大陸的網絡事件，其影響較大者，多為自發的網上抗議。有些事件涉及到以網絡社區為基礎的組織動員，或網外的公民組織的動員，但這類例子數量少，一般來說影響比不上自發性的抗議。框架建構概念的問題，是過分強調運動領導和組織的作用 (Benford, 1997)。網絡事件中，雖然也會出現「框架」，但其機制卻不同，往往是在群體互動的過程中自發形成。與其說網絡事件得益於框架建構，不如說它們是互動式的「抗議性談話」(Tilly, 1998)的結果。這一點下文再詳述。

關於中國大陸網絡公民行動的研究，從內容上看，研究涉及到的有網絡異議 (Chase & Mulvenon, 2002)、網絡民族主義 (Liu, 2005; Wu, 2007)、網絡事件 (Yang, 2003c, 2009; Zheng, 2008; 彭蘭, 2005)、跨國網絡宗教或教派活動 (Thornton, 2008)、網絡救助 (章友德、周松青, 2007)、通過網絡組織的民間聚會和各類民間公益行動 (韓恆, 2008)等。從理論和分析框架上看，現有研究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比較重視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等社會運動理論的運用，其理論出發點是基於個人利益的集體行動。有學者借助資源動員理論，分析了一個網絡民間救助案例，認為麥卡錫和扎爾德所闡發的資源動員理論「在我們所關注的網絡情景下的社會動員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章友德、周松青, 2007: 87)。另一類研究側重文化和歷史層面的分析，強調認同在集體行動中的重要性。如從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角度探討網絡事件的發生與影響 (Yang, 2003a, 2003b)，對網絡事件進行話語分析 (Liu, 2006; Farrer, 2007; Yang, 2008)，或用新社會運動理論闡釋網絡在民間聚會行動中的作用 (韓恆, 2008)。也有學者根據布爾迪的場域理論，用網絡輿論場的概念分析網絡事件，認為網絡事件是公民性的體現 (師曾志, 2007)。

本文認為，網絡事件在形式上與傳統的以街頭抗議為主的社會運動的主要區別，在文化層面而不在政治結構或社會組織層面。網絡事件的核心是話語。在網絡事件中，話語就是行動。沒有話語，就沒有網絡事件。因此，如果不能揭示話語在網絡事件中的力量，就不能充分闡釋網絡事件的動因與影響。本文認為，網絡事件的話語力量，來自情感的表達。因此，如何揭示網絡事件中情感表達的邏輯，是揭示網絡事件動因的關鍵所在。

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

在日常生活和社會運動中，情感佔居核心地位。喜怒哀樂，愛憎恨怨，構成生活中的情感力量。沒有情感的生活，就是沒有活力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情感的表達，就沒有社會運動。古往今來，不論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都是帶感情色彩的行動。往往是行動的方式愈激烈，情感色彩愈重。所以大革命的時代，是最富有激情的時代。美國有學者提出，近些年美國左翼力量缺乏號召力，原因之一就是左翼運動缺少政治激情。相比之下，右翼宗教運動則依靠近乎癡狂的熱情，動員了廣泛的基層力量(Hart, 2001)。

社會運動研究曾對情感因素予以排斥。六十年代之前很多關於群體行為的研究，均認為群體行為是非理性的感情所致，是病態的表現。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勒邦的《群氓》。實際上，他把群體行為誣衊成暴民行為，具有明顯的貶低民眾抗議的意識形態特徵。七十年代興起的資源動員理論，其歷史意義正是在於對這種保守的群體行為理論提出了批判，肯定了社會運動的合理性。當時，六十年代西方學運的參與者已經步入社會。他們中間進入學術領域者，從個人經歷出發，對學運和社會運動給予肯定(如Sica & Turner, 2006)。但隨着資源動員理論的興起，社會運動理論卻走向另一個極端，研究重心完全轉移到社會運動組織，忽視了文化和情感因素。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隨着文化分析的興起，這一局面才有所改變(Goodwin, Jasper, & Polletta, 2001; Yang, 2007)。

文化分析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興起，有三方面思想背景。第一是受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影響。新文化史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忽視文化的傾向做出批判，強調文化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和獨立性。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與階級》(Hunt, 2004)。作者亨特認為，不管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史學，還是托克維爾式的以國家權力為核心的理論，他們對於法國革命的研究，重點都是革命的起源與結果。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認為法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資產階級既是法國革命的發起者也是其受益者。托克維爾則認為，法國革命起源於對君主集權的抗爭，其結果卻是使國家權力更加集中。

亨特認為，這些經典研究只看到起源與結果，完全忽略了革命過程和革命經歷的重要性。她提出，革命的邏輯實質上是貫穿於革命進程中的政治文化。因為政治文化由語言、意象、修辭等象徵實踐 (symbolic practice) 所構成，所以分析的重點，在於揭示這類象徵實踐與革命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簡單的機械反映，而是建構。政治文化直接推動了革命的進程。在中國研究領域，華志堅與裴宜理合編的《現代中國的群眾抗議與政治文化》(Wasserstrom & Perry, 1994)，有意識地吸納了新文化史學對社會運動中政治文化的重視，是較早開始對中國的社會運動進行新文化分析的作品。

文化分析興起的第二個背景，是歐洲新社會運動 (new social movements) 理論。新社會運動的核心概念是認同和表達，故其理論又稱為「基於認同的理論」(Cohen, 1985)。新社會運動所研究的內容，以六、七十年代以後的環境運動、和平運動和女性運動為主。研究者發現，此類運動參與者追求自我價值的表達，他們在參與過程中，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實踐自己的信念。他們未必參加什麼正規的運動組織，但卻有自己的社會網絡，通過非正式、自發、象徵性的行動和不拘一格的風格，挑戰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這樣的社會運動，是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的結果。因此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建構的過程 (Melucci, 1996)。

文化分析興起的第三個背景，是美國社會運動界內部對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模式的批判。這方面的批判與亨特 (Lynn Hunt) 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批評有理論淵源，均集中於兩種理論的結構主義傾向。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理論分析的重點是運動之前的社會結構變化，忽略了運動過程中行動者的主體經驗、互動關係和文化因素。對資源動員理論的批判由來已久 (Kerbo, 1982)。琵溫 and 克拉德 (Piven & Cloward, 1977) 認為，窮人造反不是靠組織資源，而是靠體制外的抗議活動。抗議才是他們唯一的資源。論組織資源，他們決不能與自己的對手抗衡。後來兩人發表長篇論文，對資源動員理論忽視怨憤，過分看重運動組織的傾向做了較系統的批判 (Piven & Cloward, 1995)。

對於政治過程理論的批判，同樣很多。率先宣導研究社會運動的情感學者古德溫和賈斯伯於 1999 年在紐約大學組織了開先河的「情感

與社會運動」學術討論會，並在同年發表文章，對政治過程理論做了批判。他們指出了政治過程理論的結構主義傾向和片面性，說政治過程理論認為社會運動在政治機會比較開放和有力的情況下容易發生，但在很多情況下，實際是政府鎮壓導致更強烈的反抗 (Goodwin & Jasper, 1999)。

在資源動員和政治機會理論受到批評的情況下，其代表人物麥卡亞當、特羅和梯利等三人開始修正他們的理論。他們在備受爭議的集大成之作《抗議的動因》中，承認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明確寫道：

我們來自結構主義的傳統。但是，在我們對歐美大量的抗議政治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有必要重視策略性的互動，人的意識，以及歷史積澱起來的文化。我們現在認為，人際網絡、人際交流及各式各樣的連續性的協商，包括認同的協商，在抗議的過程中佔據核心地位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22)。

同年出版的《抗議政治研究中的沉默與聲音》一書中，發表阿敏匝德與麥卡亞當合著的文章，呼籲重視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 (Aminzade & McAdam, 2001)。

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在內容和方法上觸及到社會運動文化的很多方面，如傳統、習俗、儀式、價值觀、音樂、文學、媒體、象徵、意象、漫畫、敘事、話語、情感等對集體行為的影響。對於情感因素的分析，是文化分析中比較有影響的支流。

社會運動的情感動因

社會運動研究對情感的重新審視，是受到情感社會學的影響。從八十年代起，登齊爾 (Denzin, 1984)、肯珀 (Kemper, 1990) 和霍赫切爾德 (Hochschild, 1984) 等社會學家，把情感問題納入他們的研究視野。霍赫切爾德的《受管制的心》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作品。作者通過研究航空公司服務員的情感表達，發現資本主義的剝削與管理方式已從對勞動力的剝削深入到人的感情和內心。機上的服務員不管個人內心有什麼的不愉快，都要對乘客笑臉迎送。這種勞動她稱之為「情感勞動」

(emotional labor)，其規則是一種由社會制定的「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社會的權力結構和不平等關係決定了什麼樣的人可以表達什麼樣的情感。在官僚體制裏，上級、老闆可以對下級發脾氣，反過來卻不行。霍赫切爾德認為，當代社會的主流情感文化是「情感管理」。它迫使個人「管理」他們的情感，根據場合的需要，或壓制或刻意製造喜怒哀樂。這是工具理性的情感文化，其結果是人從內心深處的異化。

霍赫切爾德關於情感管理論述的意義，在於說明情感的社會屬性。情感不僅僅是生理的和心理的，更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因社會文化而異。受此啟發，有學者研究了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如何控制和克服恐懼、羞恥等負面感情 (Goodwin & Pfaff, 2001)，培養、激發、表達自豪和喜悅的感情 (Whittier, 2001)。也有的研究憤怒在集體行動中的重要性。賈斯伯 (Jasper, 1998) 討論了多種與社會運動相關的情感，如愛、恨、信任、尊敬、忠誠、憤怒、悲傷、羞恥，提出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必須懂得這些情感因素對於運動參與的影響，才能積極調動有利於動員、克服不利於動員的因素。弗蘭 (Flam, 2005) 把社會運動內部的情感與針對抗議對象表現的情感區分開來，分析了兩類情感對集體行動的不同影響。裴宜理 (Perry, 2002) 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除了意識形態、嚴密的組織和社會結構等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共善於情感動員，會做「感情工作」。中共在各時期發起的大小運動，土改時期的「憶苦思甜」，實際上就是情感動員的運動。

上述研究，沒有完全脫離資源動員的框架，只不過把情感當成了一種新的資源。這就把情感工具化、簡單化了，無法揭示情感在集體行動中的核心作用。集體行動中的情感，不是簡單的資源或工具，而是鬥爭的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集體行動有其情感邏輯。這個情感邏輯也就是霍尼斯 (Honneth, 1995) 所說的社會衝突的道德語法。霍尼斯認為，社會秩序的維持靠人們的「相互承認」，而承認則有不成文的規則。當這些規則受到侵犯時，受侵犯者的個人尊嚴和個人價值便受到損害，導致感情受傷害。在國際關係中，當一國做出侵害另一國尊嚴的事情時，受害國會說：「你們傷害了我國人民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人們的感情受到傷害時，他們才起來抗爭，故有「憤起抗爭」之說。當人們因感情受到激發而參加集體行動的時候，不是他們

失去了理智，受到感情的盲目支配，而是他們的道德原則驅使他們採取行動。他們的抗爭，是爭取承認的鬥爭。這種承認的鬥爭，也就是認同的鬥爭。

新社會運動的重要理論家莫魯奇 (Melucci, 1996: 71) 認為，關於認同的研究過分偏重認知的內容 (如觀念和思想)，忽略了情感內容。人們感覺到同屬一個集體，這是情感投入。因為有情感投入，所以集體認同就不是簡單的患得患失。激情、愛、信仰、忠誠等情感，在集體認同中均佔有重要地位。往往是這些情感因素，鼓舞人們做出勇敢的抗爭行為。Yang (2001: 594) 提出「情感實現」(emotional achievement) 的分析框架，認為「情感的實現同時也是認同的實現」，並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中國大陸八九學運的動員過程，是情感和認同驅動的抗爭。

社會運動中情感動員的主要方式是情感的表達。情感表達依賴各種載體和象徵手段，如話語、音樂、漫畫、詩歌、順口溜、口號、標語等。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這些傳統的表達方式被賦予新的能量，傳播面廣、速度快、發佈管道多。同時出現了視頻、短信、閃客、播客、博客等新的表達方式。

目前對於社會運動的情感研究，使用最多的是書面資料，如運動中產生的話語、故事、音樂、漫畫、口述史、媒體報導等 (Eyerman & Jamison, 1998; Yang, 2001, 2005; Goodwin & Pfaff, 2001; Polletta, 2006; Reger, 2007)。隨着電子媒介的普及，關於社會運動的影像資料將為情感研究提供重要的直觀資料，因為影像可以有聲有色地記錄運動參與者的情感表現。網絡的發展和網絡事件的出現，也為社會運動的情感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學者已經對新媒體利用諷刺漫畫等手段製造幽默滑稽的情感效果，從而開展抗議活動進行了研究 (Wettergren, 2005, 2009)。中國大陸的網絡事件主要發生在網絡社區，因此研究社區裏有關該事件的帖子，是揭示該事件發生的過程和原因的重要手段。

網絡事件屬於典型的「抗爭性談話」(contentious conversation)。「抗爭性談話」是梯利提出的概念。梯利出版於1978年的專著《從動員到革命》，本是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理論的奠基之作。但他在九十年代後期，開始注意文化因素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他說社會運動如同日常生活中的談話，其本質是一種互動，只不過社會運動是「抗爭性談話」

(Tilly, 1998)。網絡事件發生在網上社區和BBS論壇，主要形式是發貼和回帖，因此「抗爭性談話」在網絡事件中的重要性格外突出，甚至可以說沒有「抗爭性談話」，就沒有網絡事件。主帖發出後，能否釀成有社會影響的網絡事件，要看「抗爭性談話」如何發展。一般來說，不能調動感情，就難以發展成網絡事件。反之，能讓人感動，給人震撼的，則容易發展成有影響的網絡事件。這就是情感動員的過程。

本文用個案研究的方法，通過對具體網絡事件的文本分析，揭示事件發生的情感動因。網絡事件的文本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在內容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文本所表達的訴求、怨憤和情感。在形式上，本文重點分析文本的修辭及修辭效果。研究網絡文本的修辭，符合網絡文化特點。人們常說網絡依賴的是注意力經濟，網站的點擊率要看網上內容能否吸引注意力，而修辭正是吸引注意力的策略(Lanham, 2006)。因此，分析網絡事件的修辭學，就格外重要。網絡表達對於表現手法的追求，造成對表現形式的重視。沒有吸引注意力的表達形式，很難造成大的傳播效應。但僅有形式，缺乏內容，也不足以產生大的影響。

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兩種情感動員

網絡事件在情感表達上，大體可分兩種。一種以悲情為主，常伴有同情和義憤，涉及社會問題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很多網絡事件屬此類，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7年的「重慶釘子戶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等；有些涉及道德倫理的網絡文化事件，因激起公憤，進而觸發廣泛論爭和抗議，也屬此類，如2006年的「虐貓視頻事件」和2007年的「南京燒狗事件」。很多網絡事件帶有戲謔的特點，其格調是調侃和幽默，總體效果近於網絡狂歡，涉及文化的網絡事件多屬此類，如2005年胡戈惡搞電影《無極》和趙麗華詩歌事件。從文學理論家弗萊(Frye, 1957)的文學類型學來看，以悲情為主的網絡事件，應屬「悲劇」或「傳奇」類型；以戲謔為主的事件，則屬「喜劇」或「諷刺」的類型。不同類型的網絡事件情感效果有所不同，但生成的過程，都依賴情感動員，都有其「道德語法」和情感邏輯。以下分析兩個案例。

《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

該案例的情感動員邏輯是戲謔。戲謔的對象是當代精英文化和影視文化，戲謔背後所反映的是草根文化與霸權文化的價值衝突。網民通過表達與小人物胡戈的認同，一方面表達了自身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表達了對精英文化的批判。

2006年胡戈製作的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下稱《饅頭》)，惡搞陳凱歌執導的新片《無極》，在網上迅速傳播。當陳凱歌表示要對胡戈提出起訴後，網民對此展開了廣泛爭論，使該事件演變成草根網民PK名人大腕的網絡文化事件。網民一邊倒地支持胡戈，對陳凱歌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搜狐網的「左右間IT評論」頻道讓網友投票，「為凱歌辯護Vs支持胡戈」。結果在10,728票中，支持胡戈的佔93%，支持陳凱歌的僅有2.6%(剩下的4%誰都不支持)。

《饅頭》的風行，主要原因是它搞笑，但它的搞笑並不是無稽之談，而是聯繫到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它把電影《無極》中的人物和情節放到當前中國社會的情境中，一方面嘲弄了《無極》荒誕無稽的故事情節，同時又把這些情節賦予現實意義。弗萊(Frye, 1957: 223)說諷刺文學類型的特點是給不理想的現實生存賦予一定的形式。《饅頭》的社會意義就在於給當代中國「不理想的現實生存」賦予了能夠快速傳播的網絡視頻的形式，其中所反映的「現實存在」包括工資拖欠、農民工、城管腐敗、無證商販、廣告商業文化等。如關於城管，劇本有這麼一段話：

(相關畫面，真田廣之率領城管大破無證商販集散地，一邊打一邊還罵「我叫你擺攤！我叫你擺攤！」無證商販們紛紛求饒：「我再也不敢了……」)

兩年後的2008年1月，《饅頭》所諷刺的關於城管的社會問題，以悲劇形式發生在現實社會。湖北天門市的城管毆打無辜公民魏文華致死，引起廣泛的網絡抗議，說明城管問題的嚴重性。

《饅頭》的風行與其富有創意的表現形式直接相關。其中最大特點是將文學和影視創作中常見的樣式(genre)「戲擬」(parody)賦予了新媒

體的表現和傳播形式。其素材直接來源於所模仿和嘲諷的對象《無極》，同時融入當代影視文化的因素，如以央視《法制線上》節目為框架，並模仿電視節目，穿插商業廣告。在劇本創作和鏡頭剪輯上，《饅頭》的主要手法是拼貼。作者將本不相關的材料放到一起，通過對照、引用、仿擬、移就、反覆、誇張、諷喻等多種修辭手法，製造出滑稽、新奇和幽默的效果。如下面這段旁白中，引用毛澤東《紀念白求恩》中的句子，獲得幽默效果：

真田局長原是日本人，五十多歲了，為了向中國人民謝罪，他義無反顧投靠了中國，加入到中國現代化建設中來。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建設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難道這位深明大義的國際友人與本案有什麼關聯嗎？

這種戲謔的效果使《饅頭》讓人喜聞樂見。這種喜聞樂見的創作，配以新媒體的特殊傳播功能，使得該視頻很快傳遍網絡，並被傳統媒體大量報導。

除自身的幽默滑稽吸引觀眾之外，《饅頭》之所以成為網絡事件，還在於它引起了廣大網友對大人物的憤慨和對網上小人物的同情，由此引發「抗爭性談話」(Tilly, 1998)。2006年1月份該視頻在網上傳開後，《無極》導演陳凱歌於2月初表示將起訴胡戈侵權。網上頓時掀起軒然大波，論壇裏的爭論涉及知識版權、婚姻、家庭、隱私、道德規範、娛樂圈內幕等多種話題。僅在新浪網上，關於《無極》和《饅頭》的帖子就無以計數。網友們嬉笑怒罵，一邊倒地支持胡戈，把他當成解構霸權文化的網絡英雄。僅以發表於2006年2月16日的若干帖子為例。有網友發帖：「感謝《饅頭》帶給我的快樂。感謝各位的評論帶給我更多的快樂。真是愈看愈快樂！」支持者中很多人表示願意捐款幫助胡戈打官司，有人說：「胡老弟，別怕，我們支援你，非常情況下我們可以為你捐款！」另一個把胡戈的事件，提高到了「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高度：

現在又不是大清朝時代，也不是大家都必須做到院子裏看電影的

貧乏時代，現在是腦裏激蕩、言論和信息自由的網絡時代……。面對「強權」，胡戈一個人面對更好地，人氣會愈來愈高，所謂孟子言：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一萬年以後，還會變成一裝網絡pk電影的好看的公案哩！

還有很多帖子借題發揮，對當代文化界「為名利所累」的狀況，進行了批判。一位網友寫道：

近些年，無病呻吟的作家作品實在太多，為名利所累，讓導演、作家、作品都變了態。可悲呀。應該對這些作家作品，搞一個網上評獎會，評出本年度最臭獎、最假獎、最差獎。網絡網民應該對民族的文化負責!!!!

另一位則說：「中國電影一直是導演玩觀眾，《饅頭》出現以後，各位導演在以後的電影創作中也應該考慮觀眾的感受，把觀眾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見，《饅頭》成為有影響的網絡事件，一方面是因為它的戲謔性質，給網民提供了一個狂歡的機會，所調動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悅。另一方面，它也給網民提供了一個表達的機會，使網民有感而發，而且感觸不限於對小人物的同情和對大人物的不滿，也涉及當前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倫理、道德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感投入，很難想像網民會有如此廣泛的參與。

山西黑磚窯事件

2007年的黑磚窯事件，涉及拐賣少年兒童在磚窯做童工的黑幕。該網絡事件形成的情感邏輯是悲情與憤怒，其「道德語法」(Honneth, 1995)是良知和對極端社會不公正的憤慨。師曾志(2007)對本案例的分析，關注的是案例中公民性的體現，但也注意到案例中悲情特徵，說「黑磚窯災難與人權踐踏的事實表達，賦予了議題具有良知、關懷等悲情民意的意義，達到了喚醒民眾的目的。」(p. 382)

揭露黑磚窯的帖子，於2007年6月6日晚，以跟帖的形式首先在大

河網貼出。到6月18日，帖子點擊率突破三十萬。³該帖在6月7日被轉帖到「天涯雜談」，至6月13日，短短六天時間，點擊率高達五十八萬，有三千多篇回帖。⁴其實，黑磚窯早在當年4月就已經在河南電視台的都市頻道有所報導，但沒有引起廣泛注意，解救被拐賣孩子的工作沒有進展。據《南方週末》等媒體的後續報導，山西黑磚窯成為全國性媒體事件，直接原因是網絡民意：「網絡民意的洶湧，直接引發了傳統媒體的跟進報導，《南方週末》記者也正是根據網帖，第一時間到達了現場。其後，國家高層領導批示，山西、河南兩地政府的及時反應，一場空前轟動的黑磚窯打擊風暴就此展開。」⁵本文認為，網絡民意洶湧的主要原因，是網絡互動的過程調動了網民的情感表達，促進了「抗爭性談話」，從而獲得了情感動員的效果。以下通過對「天涯雜談」裏的主帖和回帖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過程的特點。

1) 主帖的內容、情感與表達方式

黑磚窯事件的導火索是首發於大河網又轉貼於天涯雜談的帖子《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從內容上看，帖子揭露山西磚窯主拐騙兒童做苦工，而地方政府和公安面對尋子的父母卻非常冷漠。所揭露的問題觸及弱勢群體及地方官員與公安的腐敗，是中國社會的普遍問題，因此問題本身容易引起共鳴，再配以有效的表達方式，便有了震撼作用。帖子的訴求很明確：因為政府不管，失蹤兒童的父母在網上發出近乎絕望的呼救：「在被兩地政府互相推諉之後，我們又該向誰求助？十萬火急，人命關天，誰來幫幫我們？」其訴求的基礎，是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每一位有良知的人，看到此情此景，都會想把他們都救出去。」

帖子所表達的主要情感是父親們的悲痛：「男兒有淚不輕彈。獲救孩子身上的累累傷疤，讓我們一次次的落淚。」此外也表達了對孩子生命危險的極端焦慮與恐懼：「我們不知道這些稚嫩的生命曾經經歷了怎樣的劫難，我們更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正面臨着怎樣的危險，我們是父親，我們要救出我們的孩子，可是在大山深處，陌生的環境，窯主消息的靈通，使我們的尋子之路難上加難，我們的力量太薄弱了，我們的孩子隨時都面臨着生命危險。」

對於當地政府和公安部門的冷漠，父母表示寒心：「我們的足跡踏遍了山西方面的鄉、縣、市的公安、勞動等部門，但令我們心寒的是，鄉派出所不僅置之不理，還百般阻撓刁難我們帶走已經解救出來的孩子，而且窯主對我們進行威脅恐嚇時坐視不管。」

在表達方式上，帖子的震撼力一方面來自如泣如訴的文字描繪，帖子的語言不僅有聲有色，而且帶着哭聲和喊聲。使用的意象是死亡、黑暗，以及對純潔的生命的奴役。帖子配有三幅貼圖，一幅是孩子在磚窯睡覺的土炕，第二幅是奔跑中的父母，第三張是父母親與兒子團聚後悲痛的場面。這些畫面和意象，表達了當事人的內心痛苦，從回帖看，顯然深深打動了天涯社區的網民。

2) 回帖的內容、情感與表達方式

筆者2008年12月6日查閱「天涯雜談」社區的網頁快照，發現由「lix06」在2007年6月7日11點20分轉發在「天涯雜談」的帖子，「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計有訪問量753,432，回帖22,040條，長達66個頁面，平均每個頁面334個回帖。⁶最後一個回帖由「ok格瓦拉」發於2007年6月18日9點35分。也就是說在11天之內，平均每天點擊為68,494次，回帖2,003條。以下僅以66頁跟帖中的前兩頁的內容為例，說明情感表達在該事件中的重要性。⁷

回帖的內容可分三類，一是情感的表達，二是抗議，三是行動。所表達的情感最突出的有三種，即對事件的震驚、憤怒，以及對孩子和家長的同情。在這一點上，《新快報》的報導抓住了要害：「在天涯上的數千個回帖中，網友們幾乎都表達了同一個立場——『憤怒』。」⁸例如有一名網友回帖說：「徹底震驚了！這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麼？」另一網友說：「我也是個有孩子的人，含淚看完，只要開電腦必頂此帖。我的憤怒就是我的ID。」再如：「震驚！憤怒！這都是什麼時代了，難道中國又回到奴隸社會！文明何在，良心何在?! 法律何在?! 和諧何在?! 高御狀吧！」

情感的表達，能導致行動。俗話說憤怒出詩人，社會學家則說「憤怒激勵行動」(Eyerman, 2005: 43)。天涯網友在表達個人情感的同時，或採取了某些行動(如抗議)，或表示出行動的願望和決心。抗議的目

標主要是地方政府、公安和磚窯主，但也涉及中央政府和現行政治體制。如發佈於2007年6月7日的一個帖子這樣寫道：

人民的公安怎麼可以這樣？！！！！

這就是中國的法治社會！！！！？？？

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拼命管，

這比舊社會的包身工有過之而不及，為什麼不管？憑什麼不立案？！

領導一聲招呼立即跑得屁顛屁顛，有利可圖的地方就像蒼蠅叮臭肉一樣；遇到這些孩子就不能立案了？這是什麼邏輯？

網友「shd2005」寫道：

我不知道他們的良心被什麼吃掉了，我只覺得，當員警和黑心窯主結成同盟的時候，當他們在幹這些罪惡的勾當的時候，當孩子的父母在撕心裂肺的時候，我們作為旁觀者——整個社會，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唾罵那些無良的員警和黑心窯主，把他們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用輿論的棍棒無情地鞭笞他們！我們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力所能及地為孩子的父母吶喊，讓全心他們知道有整個社會在支持他們，那些吃人的員警和黑心窯主終將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行動方式，網上和網下的均有。網上的除回帖抗議外，還包括頂帖、轉帖、募捐、建營救組織等。網下的行動則包括聯絡主流媒體對事件曝光。極端者甚至鼓動使用暴力手段，發起暴動和革命，等等。如「鋼鐵之劉」說：「此帖不頂有罪啊！！！！！！」網友「安靜的臉」寫道：

這個一定要頂的，咬牙切齒的頂。

每個人都只有一生，某些人衣著光鮮地活在別人的鮮血上。

造成輿論壓力是對的，但是這樣的話，相幫的或者想提供具體指導的人們上哪去找你們呢？任何聯繫方式都沒有。

我認為一方面在各大論壇或者博客造成輿論壓力，但是同時

也要在網絡上選擇有效的方式找到相關能夠幫助你們的專業人士提供思路和方法。沒有一個固定的寫建議的位址？寫消息給你們？嗯，倒是可以。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咬緊牙關戰鬥下去，所有的人，這種倡狂之徒的存在，將會危及到更多的孩子，包括你我的。太沒有安全感了。

無法出力，願意為此出錢，雖然不能很多，但是如果有需要，願盡綿薄之力！

網友「齊林一」呼籲建立QQ群，共同商討有效的措施：

包括向中央電視台發信，打電話，向國外的大型媒體曝光，向國外，以及香港的慈善機構，宗教機構求救，主動去打一些相關部門的電話，成立一些組織，我願意捐款，在西安，鄭州的火車站分發一些宣傳資料，在網上發表一些宣傳資料，擴大它的影響，直到國家重視為止。

又說：「人這一輩子總要做點對得起人類的事情，對得起良心的事情，對得起同胞的事情，否則，喪鐘下一個將為你而鳴！」有一網友說：「剛剛給焦點訪談發了封E-mail，打了個電話。不知道他們重不重視！！！」並在帖子裏公佈了「焦點訪談」的電話和電子郵址。網友「赫卓非」說：「請求關天編輯，幫忙上頭條吧。跪求。」也有網友表示對社會的種種不公，已經忍無可忍：

房價高，住不起房子，我們可以忍

水污染，喝不上乾淨水，我們可以忍

但當我們的孩子，柔弱純真的孩子的生命在受威脅的時候，難道我們還能再忍下去嗎？

回帖在表達方式上比較簡單，絕大多數是單個的詞語或句子，帶有口號的性質，但言詞有力。在修辭上使用較多的是感歎、設問、比喻、對照等等。很多網友把磚窯比喻成美國黑奴莊園，或比作是解放前的舊社會。舉數例如下：

頂下，令人震驚的說。簡直是美國南部莊園再見啊。

這個帖子一定要頂!!!現在的世道，已經墮落到解放前的喪失人性的地步了!!舊社會才有的包身工，現在這麼猖獗，這還是什麼和諧社會??

這是在描寫孩子嗎?我想這些詞句只有在記錄二戰勞工的歷史書上才能找到。那些煤礦主簡直比日本人還畜生，當地政府簡直比清朝政府還無能!!!

這比美洲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貿易還要恐怖!!!

心酸啊，這邊幾百萬、幾千萬的貪污，那邊黑煤窯、黑礦井黑心囤金，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是你?是我?誰能告訴我?

「黑磚窯」事件的情感邏輯是同情與憤怒，這兩種情感與「饅頭血案」中的戲謔形成對照。它們共同構成近年網絡事件中主要的情感動員因素。兩個案例中的情感內容雖有所不同，一則為喜，一則為悲，但其動員過程表現出同樣的情感邏輯。兩個事件都是在強烈情感的表達過程中迅速擴散，造成集體行動事件。兩者都觸及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因此使事件在網民中產生共鳴。兩個案例都以網絡表達和抗議為主，但也都有從網上走到網下的行動。在表達方式上，兩者都依賴BBS和網絡社區，情感的抒發直截了當，嬉笑怒罵，不加掩飾，達到很好的互動性效果，也有助於事件的擴散。

網絡事件與當代中國的情感結構

簡單的論壇發帖和互動，通過什麼樣的過程，演變為網絡事件?除論壇的名氣、影響力和編輯的作用之外，帖子本身是關鍵因素。觸及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能給人道德震撼、引起共鳴、喚起同情與良知的帖子，容易演變成網絡事件。這個過程，可視為網絡事件的動員過程，只不過動員的主體並非社會運動中常見的運動組織，而是網民。動員的過程，從根本上說，則是網上互動。因此對網絡事件的

研究，必須闡明網絡互動過程的特點和機制。這種互動，與其說是資源動員，不如說是情感動員。互動的過程是情感表達和交流的過程。

本文通過對「饅頭」和山西黑磚窯事件的分析，揭示了網絡事件中情感動員的兩種風格。「饅頭」代表的是戲謔的情感動員風格。這類風格常見於網絡文化事件。文化事件未必帶有明確的利益訴求。網民大量參與，一則基於對主流和霸權文化和價值的蔑視和抵抗，所以他們欣賞胡戈那種對精英文化的嘲弄和調侃。二則基於對「草根英雄」的認同，這種認同，使他們產生交流與表達的渴望，並通過網上的交流與表達，對這種認同獲得確認。

山西黑磚窯的案例，代表了悲情的情感動員風格。悲情動員常見於網絡社會事件。事件多涉及弱勢群體、社會不公和官僚腐敗。當人們看到少年兒童被拐賣和奴役，而地方公安部門竟視若無睹的時候，他們的心靈被震撼，良知受到拷問，於是在悲痛和憤怒中發出抗議。社會不公觸及人們的道德底線，使網民感到必須發出他們的聲音。

網絡事件的發生不依賴資源動員，也不依賴政治機會。在網站和社區基本正常運作的條件下，網絡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給人以「道德震撼」的帖子，能夠激發網民的情感，調動他們的力量，從而刺激網絡互動，釀成網絡事件。這也同時說明，網絡事件之所以成為「事件」，吸引大量網民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感情上打動了網民。而只有從道德上給人震撼，才能從情感上讓人感動(Jasper, 1998)。愈是觸及到公民道德底線的事件，愈具有震撼力，也就愈能打動人們的情感，形成網絡事件的可能性愈大。

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認為，對於社會運動中情感因素的研究，有必要區分各種不同情感的不同作用(Jasper, 1998; Goodwin & Pfaff, 2001; Flam, 2005)。對國家機器的恐懼使人不敢參與抗爭，而在民眾中產生的憤怒、忠誠、愛、同情、信任、喜悅等情感因素，卻能促使人們參與集體行動。本研究發現，在目前中國大陸的網絡事件中，最能夠激發網民參與抗爭的情感是憤怒、同情和戲謔。

對情感動員的研究，說明有必要重新認識網絡互動中的情感因素。帶感情的，並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態的。儘管情緒化的表達，表面上似乎有違背道德倫理的時候（如罵人和侵犯隱私的駭客行為），但實質上卻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道德和價值觀的衝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近年來主流媒體對所謂「網絡語言暴力」的聲討，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體現了主流媒體所代表的價值觀對異己價值觀的聲討。

本研究的另一個意義，在於說明有必要重新審視公共領域中理性與情感的關係。哈貝馬斯宣導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不僅把婦女、工人和下層社會的人們排除在外，而且過分地強調理性話語，忽略了交際中的情感和修辭等成分（Calhoun, 1992; Lean, 2007）。上文提到，美國左翼學者對近年左翼力量缺少感召力提出批判，號召左翼政治也像右翼政治那樣注入激情。這些都說明，公共領域未必僅僅是冷冰冰的話語，激情反而可能給公共領域帶來活力。活躍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應該是有激情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中國網絡文化的活躍，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網絡空間充滿了激情的表達。這不是簡單的所謂煽情。網絡事件中的情，表達的往往是民眾對社會問題的憤怒和對權貴的嘲諷。

網絡事件僅僅是當代中國公民運動的一個部分。網上有許多其他方式的網絡公民行動，而在網下，在農村和城市街頭，每天也發生着大大小小的群體事件。網上網下、此起彼伏的公民運動，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威廉斯說情感結構是「具有典型意義的衝動、節制和聲調。具體說來也就是意識和關係的情感因素。不是與思想對立的感情，而是有感情的思想和有思想的感情……。我們可以把這些成分看作一種『結構』：一個整體，它們具有特定的內在關係，糾纏在一起，又相互矛盾」（Williams, 1977: 132）。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包括什麼要素？本文對網絡事件的分析，說明在中國的廣大網民中，普遍存在着對正義的渴望和追求，對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對貪官污吏的痛惡，對政府的失望，對權貴的嘲諷，對溝通的渴望，甚至對革命的呼喚。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內在邏輯，即情感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情感洶湧的網絡事件是整個中國社會情感結構的脈絡。

參考文獻

- 王紹光(2008)。〈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頁129-148。
- 師曾志(2007)。〈近年來我國網絡媒介時間中公民性的體現與意義〉。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編)，《北京論壇會議論文集》，頁368-386。(未正式出版)
- 章友德、周松青(2007)。〈資源動員與網絡中的民間救助〉。《社會》，第3期，頁70-91。
- 彭蘭(2005)。《中國網絡媒體的第一個十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楊國斌(2009)。〈奧巴馬勝選：網根民主時代的到來？〉。《網絡傳播》，第2期，頁56-57。
- 盧新寧(2000年5月17日)。〈強國論壇凝聚民族精神〉。《人民日報》，第5版。
- 韓恆(2008)。〈網下聚會：一種新型的集體行動——以曲阜的民間祭孔為例〉。《青年研究》，第8期，頁19-27。
- Aminzade, R., & McAdam, D. (2001).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 Aminzade, et al. (Eds.),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pp. 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ford, R. (1997). An insid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Inquiry*, 67(4), 409-430.
- Benski, T. (2005). Breaching events and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the public: Women in black in Israel.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57-78). London: Routledge.
- Calhoun, C. (1992). Introduction. In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1-4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ase, M., & Mulvenon, J. (2002).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CA: RAND.
- Cohen, J.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663-716.
- Denzin, N. K. (1984).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Eyerman, R., & Jamison, A. (1998). *Music and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yerman, R. (2005). How social movements move.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41-56). London: Routledge.
- Farrer, J. (2007). China's women sex bloggers and dialogic sexual polit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aktuell*, 3, 9-46.
- Flam, H. (2005). Emotions' map: A research agenda.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19-40). London: Routledge.

- Frye, N. (1957).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rrett, R. K.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2), 202–224.
- Goodwin, J., & Jasper, J.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1), 27–54.
- Goodwin, J., Jasper, J. M., & Polletta, F. (Eds.)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odwin, J., & Pfaff, S. (2001). Emotion work in high-risk social movements: Managing fear in the U.S. and East German civil rights movements. In J. Goodwin, J. M. Jasper, & F.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pp. 282–302).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urak, L. J. (1997). *Persuas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 The online protests over Lotus Marketplace and the Clipper Chip*.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rt, S. (2001). *Cultural dilemmas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Styles of engagement among grassroots activists*.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nneth, A. (1995).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J. Anderson,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unt, L. (200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sper, J. (1998).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reactive and affe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3, 397–424.
- Kemper, T. D. (Ed.) (1990).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SUNY Press.
- Kerbo, H. R. (1982). Movements of “crisis” and movements of “affluence”: A critique of depriv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6(4), 645–663.
- Lanham, R. A. (2006). *The economics of attenti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an, E. (2007).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F. L. F., & Chan, J. M. (2008).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84–101.
- Liu, S.-D. (2006). 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1), 144–155.
- McAdam, D. (1989).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44–760.

- McAdam, D., McCarthy, J., & Zald, M. (1988). Social movements. In N.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pp. 695–737).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McAdam, D., Tarrow, S.,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zak, S. (1989). Analysis of events in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19–141.
- Perry, E. J.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2), 111–128.
- Piven, F., & Cloward, R.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Piven, F., & Cloward, R. (1995). Collective protest: A critique of 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 In S. Lyman (Ed.), *Social movements: Critiques, concepts, case-studies* (pp. 137–16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olletta, F. (2006). *It was like a fever: Storytelling in protest and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ger, J. (2007). Where are the leaders? Music,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10), 1350–1369.
- Rheingold, H. (2002).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eus Publishing.
- Sewell, W. H. Jr.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 841–881.
- Sica, A., & Turner, S. (Eds.) (2006).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Sixti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inberg, M. (1999). The talk and back talk of collectio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3), 736–780.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rnton, P. M. (2008). Manufacturing dissent in transnational China. In K.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pp. 179–204). Cambridge, 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1998). Contentious conversation. *Social Research*, 65(3), 491–510.
- Vegh, S. (2003). Classifying forms of online activism: The case of cyberprotests against the World Bank. In M. McCaughey & M. Ayers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71–95). New York: Routledge.
- Wasserstrom, J., & Perry, E. J. (Eds.) (1994).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Wettergren, Å. (2005). Mobilization and the moral shock.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99–109). London: Routledge.
- Wettergren, Å. (2009). Fun and laughter: Culture jamming and the emotional

- regime of Late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8(1), 1–15.
- Whittier, N.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hittier, N. (2001). Emotional strategies: The collective reconstruction and display of oppositional emotions in the movement against child sexual abuse. In J. Goodwin, J. M. Jasper, & F.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pp. 233–25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X. (2007).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Yang, G. (2000a). The limin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d Gua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Sociological Forum*, 15, 379–406.
- Yang, G. (2000b). 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593–614.
- Yang, G. (2001). 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593–614.
- Yang, G. (2003a).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43(3), 405–422.
- Yang, G. (2003b).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5(4), 469–490.
- Yang, G. (2003c).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36), 453–475.
- Yang, G. (2005). Emotional ev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In H. Flam & 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79–98). London: Routledge.
- Yang, G. (2007). Emotions and movements. In G.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pp. 1389–139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Yang, G. (2008).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In K.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pp. 126–14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ma,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1. 以上關於網絡事件的定義及集體行動「事件」的討論，得益於「新媒體事

- 件：網絡、公民與社會權力的重構」工作坊同仁的討論。
2. 奧巴馬在總統競選中，自己親自加入網上社區，充分發動所謂「網根」，在美國標誌着基於社會網和博客的網上運動的勃興，已經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楊國斌，2009)。
 3. 見〈網上發貼揭露山西黑磚窯神秘母親曝光〉，《南方週末》，2007年7月12日。轉引自《北京青年報》網絡版：<http://bjyouth.yynet.com/view.jsp?oid=22027688>。
 4. 〈上千孩子被賣黑磚窯做苦工〉，金羊網《新快報》，2007年6月13日。轉引自<http://news.sina.com.cn/c/p/2007-06-13/010412008770s.shtml>。
 5. 同註3。
 6. 引自<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free&idarticle=926643&part=0&flag=1> (2008年12月6日下載)。
 7.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free&idarticle=926643&part=0&flag=1> (2008年12月6日下載)。以下引文均出自該頁面的回帖。
 8. 同註4。